

柳宗元集

第三册



柳宗元集

第三册

中華書局

柳宗元集

(全四册)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天津新華印刷二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9⁵/₈。印張10 插頁·1,000 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數 1—21,000 册

統一書號：10018·437 定價：5.65 元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一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詳註詩曰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注云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在淮

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平吳元濟在淮蔡故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

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平淮西碑能萃然聲唐類

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萃然聲唐類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謂

封建論退之所無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

五百家註立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窮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為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為柳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論以折退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繼與禹錫書云九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

宋刻五百家注本

暨校添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韓曰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
帝立原廟里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

高童曰高羊氏之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張

書元首明義股肱聖德一作天而內行禪元臣

然天而受命四姓承孫曰舜中邦氏馬似氏

元五神環運炎德復元

河東先生集卷第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秀實也。公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公元和九年任永州刺史時。與史官韓愈政。四十二年集又有與史官韓愈政。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二年邠寧

為涇州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是歲正月以

刺史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王子晞為尚

度等使治河中書為尚書丞誤丁晞音希不領行營節度使

書為尚書丞誤丁晞音希不領行營節度使

頂天閣卷八

前言

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字子厚，是我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他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人稱柳河東；曾貶官柳州，因又稱柳柳州。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一歲中進士，二十六歲第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後又任藍田尉，監察御史裏行。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年），與劉禹錫等一起參加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升任禮部員外郎。不久，革新失敗，被貶爲永州（今湖南零陵縣）司馬。十年後，改貶爲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又四年，病逝于柳州，年四十七歲。

柳宗元一生，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憲宗四朝，但他的主要活動是在貞元、元和時期。這時經過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已開始走下坡路，爲舊時史家稱道的所謂盛唐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這場大亂以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和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而且都進一步激化了。藩鎮軍閥依然擁兵割據，並且從河北四鎮擴展到內地。這些藩鎮跨州連縣，「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兵志），「各擁勁卒數萬，治兵

543832/06

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資治通鑑卷二二三)，父傳子繼，儼然成了與王朝中央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在王朝中央內部，宦官專權也日甚一日。他們掌握中央禁軍，左右朝政，威懾皇帝，權傾海內。朝中宦官當權派和地方藩鎮軍閥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結，狼狽爲奸，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他們橫征暴斂，恣行吞併土地，造成工商蕭條，農村凋敝。在地主階級(宦官當權派和藩鎮軍閥本身也是大地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廣大農民紛紛破產逃亡，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在階級矛盾激化、唐王朝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一些有識見的人物，爲了維護唐王朝的統治和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起而要求抑制宦官和藩鎮的特權，維護以皇帝爲首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革除一些喪失民心的弊政，使勞動人民的沉重負擔有所減輕，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柳宗元在順宗時和王叔文等一道所進行的政治革新，就是這種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

德宗貞元年間，柳宗元在任監察御史裏行時，就和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結下了深厚友誼。王叔文當時爲東宮皇太子李誦的侍讀，經常利用機會和太子議論朝廷弊政，希望太子在即帝位後能有所改革。太子李誦對王叔文的政見頗爲賞識，所以當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年)正月繼承德宗李适即帝位以後，立即起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人物。柳宗元被擢升爲禮部員外郎，深受王叔文的器重，是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他們執政後，便實行一

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如罷黜罪惡昭著的貪官污吏，取締劫掠民財的「官市」和「五坊小兒」，免除正稅以外的苛捐雜稅，把長期被藩鎮壟斷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釋放部分宮女和女樂，裁減閑雜人員，並着手接管宦官兵權（因遭抵制未能實現），等等。這些措施，打擊了以宦官和藩鎮爲代表的腐朽勢力，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由於宦官和藩鎮的勢力相當強大，革新派缺乏廣泛、堅固的社會基礎，所以這次革新運動在他們的聯合反撲下，很快就夭折了。以宦官俱文珍（卽劉貞亮）爲代表的宦官勢力，和以韋皋（劍南西川節度使）爲代表的藩鎮軍閥勢力勾結起來，逼迫順宗李誦把皇位讓給太子李純（憲宗）。接着便對革新派進行迫害，王叔文被殺，王伾被逼死，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被貶謫爲邊遠諸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政治上的失敗和被貶逐，在柳宗元的生活道路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在這以前，年青的柳宗元在政治上頗有一番抱負，嚮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在理想幻滅以後，他便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認爲「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寄許京兆孟容書），渴望「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與顧十郎書）。他發奮鑽研經史諸子，「讀百家書，上下馳騁」（與楊京兆憑書），寫自己的體會，「以志乎中之所得」；遇到荒謬之處，他就常常「勇不自制」地進行批判，

「以救世之謬」(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他的文學性的散文和詩歌，大多是有感而發，或揭露社會黑暗，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或諷時傷世，矛頭實指向腐朽勢力；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以寄托他的悲憤。長期的貶謫流放生活，使他比較深刻地觀察到社會的黑暗，體驗到勞動人民的疾苦，從而使他的作品有較豐富的思想內容。他留傳下來的七百多篇作品，絕大多數是在貶官以後寫的。其中有不少優秀篇章，在我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直閃耀着光芒。

在政治思想方面，柳宗元主張融合先秦以來各家的政治學說，但他最推崇的是「堯、舜、孔子之道」。他的政治理想，是所謂「立仁義，裨教化」，「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寄許京兆孟容書)。他表示自己「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嫌」(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然而，他並不專宗一家，而是認爲楊、墨、申、商、刑、名、縱橫、釋、老等各家學說「皆有以佐世」，主張「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他認爲這些學派都是「孔氏之異流」，「與孔子同道」，主張把這些學說「通而同之，搜擇融液」，使之完全符合于「聖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柳宗元反對藩鎮割據、主張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突出地反映在他的著名論文封建論中。他總結了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和分封割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說明只有實行郡縣

制，廢除「繼世而理」的分封世襲制，才能作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才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把擁兵自重的藩鎮斥之爲「慮害方域」的「桀猾」，「叛將」，有針對性地提出「善制兵，謹擇守」的建議，主張把兵權和郡縣官吏的任免權集中於王朝中央。

柳宗元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特別是反對宦官專權。在六逆論中，他批判了左傳把「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看作「亂之本」的傳統觀念，反對用人看貴賤、親遠、新舊，主張只根據「賢」「愚」作標準。在送崔子符罷舉詩序中，他主張選拔人才時不僅根據辭章，還必須「觀其行，考其智」，看是否德才兼備，可以「化人及物」。他認爲宰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廣泛地「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梓人傳)。在晉文公問守原議和桐葉封弟辯中，柳宗元還借題發揮，反對宦官參政和專權。

柳宗元早年懷着「致大康于民」、「利安元元」的抱負，被貶逐以後所盼望的仍然是「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並且以「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與朋友共勉(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他嚴厲抨擊貪官污吏們對勞動人民的騷擾，要求給他們「蕃生」「安性」的權利(種樹郭橐駝傳)。在捕蛇者說和田家等詩文中，他深刻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疾苦，並寄予同情。針對當時「賄賂行而征賦亂」的不合理現象，他主張「定經界，覈名實」，實行「均

賦」，適當減輕貧戶負擔，增加富戶賦稅，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答元饒州論政理書）。這種主張，雖然只是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但仍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時，在他的職權範圍內，也曾經作過一些對勞動人民有利的事。

在哲學思想方面，柳宗元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貢獻。

唐代中葉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主要是圍繞着「天人之際」即人和天的關係問題而展開的。當時流行的神學天命論思想，適應宦官、藩鎮爲代表的腐朽勢力的要求，有利于維護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則是革新派進行改革的思想武器。

柳宗元繼承並發揚了荀況、王充等人「元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思想，認爲「天」同瓜果、草木等自然界一切物質的東西一樣，是由渾沌的「元氣」構成的，一切都統一于「元氣」，不存在離開「元氣」而獨立存在的有意志的「天」（天說）。他指出「天」是「無營以成」，「無功無作」，是「陽氣」的無限積聚而成，陰陽二氣在無邊無際的宇宙間相互作用，「吁炎吹冷，交錯而功」，推動着宇宙的運動發展（天對）。在非國語三川震一文中，他駁斥了把地震看作

「天人感應」的胡說，指出天地山川、陰陽二氣都是「自動自休，自峙自流」，「自鬥自竭，自崩自缺」，「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地震就是在這運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然現象，就好像蒸氣的「涌溢蒸鬱」和水力的「衝盪潰激」一樣。這些試圖從自然界本身來說明自然界運動的觀點，含有樸素辯證法的因素，是非常可貴的。

柳宗元認爲自然界的「天」和社會人事「各行不相預」（答劉禹錫天論書），人的吉凶禍福，社會的興衰治亂，都非「天」所能主宰，而是「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說）。他還認爲，要「變禍爲福」，決不能依靠「天命」，而是「在我人力」（愈膏盲疾賦）。在非國語中，他以大量篇幅批判了國語一書所宣揚的天命論，詳盡地闡述了他的無神論思想。他甚至在給皇帝歌功頌德的文章中，也大膽地駁斥了董仲舒等人宣揚「天人感應」的符瑞說是以「淫巫瞽史」之言來「誑亂後代」，並且指出皇帝「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受命于生人之意」，否定「君權神授」的反動說教（貞符）。在斷刑論、時令論等著作中，他還深刻揭露了「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那種把刑政制度神權化的荒唐。

對於歷代反動統治者宣揚天命論的反動目的，柳宗元也作了揭露。他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國語神降于幸）「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斷

刑論）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柳宗元認為，歷史的發展，既非由「天」意決定，也不是「聖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而有其客觀的必然趨勢。在封建論中，他以進化的歷史觀分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指出分封制的產生「非聖人意也，勢也」。他認為郡縣制之取代分封制，是不可改變的客觀趨勢。當然，由於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他不可能揭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和客觀規律，他的歷史觀仍然是唯心主義的。從封建論和貞符等文看，他所說的「勢」，實際上是「生人之意」的另一說法。他把「生人之意」看作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而不懂得決定社會發展的歸根到底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應指出，他在當時能提出上述觀點，否定「天」和「聖人」創造歷史，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我國文學史上，柳宗元佔有重要的地位。無論是在文學理論或文學創作上，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對當時文風的改革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唐代古文運動，是一次提倡樸實流暢的散文、反對辭藻華麗內容空洞的駢文的文學革新運動。柳宗元針對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的流弊，提倡「文者以明道」（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強調文章要「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他說：「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

（楊評事文集後序）這就是說，要用文學這個武器來歌頌贊揚美好的事物，批判諷刺醜惡的

事物。他指出，不顧內容，片面地講求辭藻華麗，就等於「用文錦覆陷阱」，是要害死人的。另一方面，他也很注重文采，認為「言而不文則泥」，文采是「固不可少」的（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這表明了他主張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當然，他所主張的思想性，從本質上說是爲地主階級服務的。他所說的「明道」或「輔時及物」之類，指的就是要闡明堯、舜、孔子之道，要求文章能觸及時事，輔助朝政，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此外，柳宗元對作家思想品德的修養問題，寫作的態度問題，繼承與創新問題，文學源流與風格問題，藝術技巧問題，等等，也都發表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意見。

柳宗元的文學創作，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他把文章大別爲兩類：「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導揚諷諭，本乎比興」。並認爲對這兩方面，古來文人「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楊評事文集後序）。事實上，他自己就二者兼能，既長于著述議論，又長于比興諷諭。他根據內容的需要，創造性地運用文學形式，在藝術上有較高的成就。

柳宗元的寓言散文，一般都短小精巧，含意深刻。他通過描寫老鼠、熊、蝮蛇、尸蟲、蝮蛇等形象，揭露當時社會各種醜類的可憎面目，嘻笑怒罵，痛快淋漓地加以諷刺和鞭撻。他把主要鋒芒指向那些竊據要職的宦官及其所豢養的幫凶爪牙，指斥他們「搖動禍機」，「譖下謾上」（罵尸蟲文），「陰妬潛狙」，「賊害無辜」（有蝮蛇文）。他有一些寓言，通過

描寫麋、驢、「海賈」、「溺者」等故事，幽默地對人們進行諷諭勸戒，意在言外，至今猶發人深省。寓言文學在戰國時期已有較大發展，但那時還只是在文章中用寓言故事作比喻，很少單獨以寓言作爲一種文學形式出現。柳宗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成就，使寓言完全形成爲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這是他的一個貢獻。

柳宗元寫的文學性傳記散文，大多取材于勞動人民，如種樹郭橐駝傳中的郭橐駝，捕蛇者說中的蔣氏，梓人傳中的楊潛，童區寄傳中的區寄，等等。他通過描寫這些人物，來寄託自己的政治主張，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儘管這些作品仍有其局限性，但勞動人民的形象比較多地被寫進文學作家的傳記散文，反映了柳宗元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這可以說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的一個發展。

柳宗元的遊記散文，也很有特色。他對山水自然景物的描繪，準確精細，富有生機，能給人一種自然美的感受。他往往借景抒情，以寄託自己懷才不遇被貶逐遠荒的悲憤。

柳宗元在形式多樣的散文中，抒發他被貶逐後憂鬱憤懣之情的佔有相當數量。這些作品雖傷感情調較重，但其中有一些作品，在藝術技巧上是有可取之處的。例如愚溪對答問等篇，他以「愚」「拙」自命，語多憤激，諷時傷世，並自慰自勵，作品構思巧妙，文辭優美。他用騷體寫的弔屈原原文，亦以自弔，借懷古烈以明心迹。懲咎、閔生、夢歸諸賦，悲遠謫，懷